

## 洪 流

5、6月间，日军已经在沿长江及北南两翼向武汉推进。武汉难以坚守，一般人都可以估计出来，躲避战争的人口的又一轮迁徙也就开始了。我们来到调关码头，才知道从武汉驶往重庆的上水客轮每天都有，从上游往下至武汉的船，隔一天才有一班。我们只好等一天。意想不到是那天傍晚，在一家小店露天汗流浹背抱着烧得通红的火锅，吃了一顿奇辣奇烫的龟肉。我从家乡起身时正在发作的疟疾，竟然从此根除了。调关不过百十户人家，旅馆里住着外地口音的商人和靠他们生活的妓女。远方风声鹤唳，兵荒马乱的气氛，也被他们带到了这个腹地滨江小镇。

盛夏江面宽阔，水位上涨到了快要漫过长堤的高度。轮船并不靠岸，只是到达码头前鸣笛，在江心放慢行驶速度。我们由年轻水手驾馭的乘载限于两人的小划子送到轮船脚下。风急浪高，攀上船舷时，差一点掉进江心喂了鱼鳖。轮船分上下两层，上层凉爽，全部乘客四人都集中在上层。他们中像是夫妻的青年男女二人，学生模样的男青年二人。他们把卧具铺在甲板上休息，我们也照办。我们

与两位学生装束的人互相观察，多半天过去了，只听见轮船劈开浪头颠簸起伏的声音，谁也不开口说话。最后我问其中一位后来知道是姓段的青年，他们是从哪里上船的。回答：“藕池。”藕池是距调关上游最近的长江码头，水路通往南县。然后我每问对方一句，对方回答以后，就用同样的话反问一遍，我照实作答。问：“你们到哪里去？”答：“武汉。”问：“到武汉以后还走吗？”答：“还走。”问：“往哪里走？”答：“西安。”问：“到西安以后还走吗？”答：“还走。”问：“往哪里走？”对方这时踌躇了一下，答：“往北走。”猜了半天哑谜，现在谜底揭开了。我们是走同一条路，朝同一方向去的。他们是南县的高中学生，想去延安上鲁迅艺术学院。问答中，他们表现出的警惕性很高。共产党这时虽不“违法”，彼此都知道，到延安去那是很犯忌讳的，要冒风险。青年们选择去延安，首先就要面对这种政治环境。他们不知道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介绍了知道的情况，他们马上表示要同我们一起行动。

第二天上午到达汉口。岸边一个班全副武装的士兵检查行李和搜身以后，挥手示意可以走了。我们四人一同去法租界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一是想了解能否搭上八路军每周一趟由武汉开往西安的军车，二是他们三人都要办理延安入学的手续。法租界在江边马路上，从西到东长约三四百米。到尽头问警察，都是重复回答：往前走。我们走了两个来回也没有找到目标。只好去请问早就一眼看见了

的一座洋房门口钢盔刺刀闪亮的站岗宪兵。他说：“这里就是。”原来办事处的牌子挂在洋房第二道门上，门外有宪兵守卫。我把长沙的经验搬到这里，自然就被瞒过了。传达室一位戴“八路”臂章的女同志回答我们的问题：军车的情况不知道，延安入学手续要到西安去解决。我仍然照搬长沙的经验，说想见董先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回答很简单：董先生不在家。武汉是这时抗战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人在战时中心活动的主要场所。陈绍禹、董必武常驻，周恩来也不断来往。难怪延安入学手续等具体事项也就不由它来办了。

来到武汉的大约十天以前，我在华容县城的扩音喇叭广播中，听到了武汉举行隆重集会纪念“七·七”一周年的消息。后来才知道，这时公布的名单中有毛泽东、陈绍禹等共产党七参政员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人民群众同时掀起爱国献金巨潮，投入支援抗战，保卫武汉的斗争。据郭沫若记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主持“七·七”纪念筹备工作，有群众献金一项，意思在于鼓舞民气。政治部主任陈诚反对，认为不会有人捐献，一定失败丢丑。蒋介石这时召见郭沫若，批给特别费一万五千元。钱不多，作用不小，郭等于奉了一道筹办纪念“七·七”的“御旨”。“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原定计划都通行无阻了。献金的五天日子里，八座献金台，掀翻了整个武汉三镇。献金的

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之间比赛，台与台之间比赛，简直是发狂了。献金的什么人都有，擦皮鞋的小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擦背的、茶楼酒馆的堂倌，他们不仅献一次两次，甚至献十次二十次，天天都在献，时时都在献，最后献金多达法币一百多万元。这个数目，主要是靠众多的贫穷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凑积起来的。有钱的人捐出金手表、白金、黄金戒指，西装、药品等，但他们人数不会有穷人多，捐献的总和恐怕也赶不上……这次来到武汉，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一年前在黄鹤楼所见到的情景。武汉隆重纪念“七·七”一周年的种种，它们先后一致，都是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独立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意志。不过上次是显示为共同的情绪激愤。这次是显示为全国广泛阶层共赴国难的行动，显示为中国旷古所未有的二三百万军队在辽阔国土上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展开殊死战的流血与牺牲精神。中华民族要独立，要解放，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我们在汉口只有十几个钟头，看不到许多街头景色。市面并不萧条，但不见车水马龙、茶楼酒肆的喧闹。马路闲逛的人很少，车站码头军人巡逻，人们遵守秩序接受检查。他们外貌上都不表明这里就是抗战高潮各方面紧张活动的中心，但他们表明这里是抗战后方的前沿，表明这里是隆重纪念“七·七”和群众用献金狂潮那种特有方式来表达中国民心民气的地方。这样的街头景色，当然主要是

显露的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绪。至于高层，据后来知道，车马群集，灯红酒绿依旧。参谋总长何应钦等的跳舞集团在汉口，每星期至少跳舞一次，并要有名媛淑女参加。前线士兵血肉横飞，阵地一天天后撤，他们在指挥中心“歌啖玉堂春，舞徊金莲步”。不知道他们何以能够如此好振以遐！

汉口开往西安的火车，一路遇到敌机轰炸，走走停停，途中没有大的惊险。第二天傍晚到达西安。头一件事就令人感到空气异样：必须凭身份证件方能登记住旅馆。我手里假冒的记者采访证，果然派上了用场，凭着它四人合订了一个房间。茶房郑重告知，军警随时要来检查，一天早中晚三次。最后一次检查，通常是晚上十点钟左右。我们决定把证件和行李放在房间里，通知账房，说外出办事去了。在街上挨到很晚才回来，躲过了检查一关。第二天早起离开旅馆去打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所在。什么也无心观看，城墙雄伟、民房低矮形成对照，是印在我脑子里的西安。

办事处七贤庄座落城北街市尽头。它的景色与我所经历的长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都不一样，看来是因地制宜吧！八、九点钟，办事处两个院子里里外外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从谈话和互相打问中，知道大家都是去延安的。彼此都放松下来，不再戒备了。他们中最多的是十几岁的青年学生，有年龄稍长的其他人。他们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个别穿军服的，肯定也不是现役军人。

西安到延安六七百华里，没有铁路，不通公共汽车。不管城市还是农村来的，这些知识分子，现在都从此练习长途步行。牵着骡子、毛驴，或携带扁担、箩筐的脚夫，站在街口，等着这些人来雇佣他们去运送皮箱、背囊、网篮等那些形形色色的行李。开价公道，他们似乎早就形成了一定“行规”。轮到我们办手续的时候，前面已经走了几批人，快到中午了。

我和刘浴生等四个人中，办事处同志看过我的介绍信，说你没有手续要办了，抗大五大队在洛川，你就在洛川入学。其他三个人既不能进抗大，也不能进鲁艺，只能进设在三原的青训班。我替他们说情，也无济于事。他们三人大失所望，情绪一下低落下去。他们坚持不走，要再次去交涉。一直到下午，当天要办手续的人都走完了，他们交涉的结果是，两个高中学生入陕北公学，刘浴生入青训班。我们雇了一名挑夫马上出发。到渭河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古人解释《诗》上的“泾以渭浊”，以为渭河清，泾河浊。眼前的渭河相当浑浊，几乎怀疑古人是否解释不准。渭河北岸高地上不多的几间房子里驻有大约一个排的军人，他们或坐或立，看着我们走过去，没有盘查。过了渭河就走在一马平川的高塬上。沿大路没有村庄，天黑以后投到路边一个独家店歇下来。不仅吃的东西卖光了，连喝的水马上也要告罄。洗手洗脸全免了。第二天东方刚发白就起身赶路，大约八点钟到达三原。四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互相告别。他们三人分头去找自己的学校，我的下

一站是耀县。

他们三人中，刘浴生来到陕北与我的行动直接相关。三原别后约四个月，刘浴生去延安，顺路到洛川找我。天已快黑，他要追赶队伍，我们在路边匆匆说了几分钟的话。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两年以后知道我这位沉毅有为的私塾同学，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做电台工作，牺牲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了。

我站在饭铺门口送他们走了，一刹时心头忽然感到孤单寂寞。但很快就看出街上行人中，三三两两，就是昨天挤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熙熙攘攘的那些人。昨天他们出发早，晚上正好在三原住宿。我立即加入到了这个人群里面。三原、耀县、同官（现在的铜川，那时也叫北同关，为了与潼关区别）、宜君、中部（黄陵）、洛川县城相距均为七十或九十华里。受雇运送行李的脚夫都不愿走长途，只在两个县城间往返。沿途的县城也就自然地成了这个人群的驿站。头一天，我一路走一路看，男男女女，三五成群，一律步行，行李驮骡上有空位，也没有人骑坐。阴凉地方歇脚，店铺打尖，前一伙走了，后一伙又来了，络绎不绝。陕北，与外面交通不便，人民生活简朴。衣食住行一派本地乡土风光。无论在城镇乡村，这个川流不息、天天经过的陌生外来人群就格外引人注目。我在耀县、同官两处镇店打尖，问店铺老板，一天中间，经过这里的外地人大约有多少，回答不一。在耀县，我问的是位女老板，她纠正我说：我们这里不兴说“老板”，那是骂人的话。

你们这些外地人不懂规矩，该叫“掌柜”。她说，一天过去多少人，那谁知道？总有大几十人吧！在同官得到的回答是：各天人数有多有少，顶多的时候兴许能到二百人。我问挑担的和赶牲口赶脚的人，他们跟外地人送行李这个活儿多长时间了，有说几个月的，有说年把的。这些回答说明每天朝延安行进的知识分子人数可观，而且长达年把光景了。

7月下旬，烈日似火，路面滚热。这些人每天长途跋涉，中午一过，镇店上往往买不上吃的东西。县城客店，也照例拥挤。好像是在宜君，因时间稍晚，我和四位同行者怎么也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最后在一家大车店马棚铺上秫秸，头对栓在槽头的两匹骡子后身睡觉。早晨醒来，我放在枕边的皮鞋被骡子踩成了破烂。幸好脑袋无恙。人们虽然疲劳，但精神旺盛。只顾奔向目标，一切都撒在旁边。有一两次，旅店只有大炕，男女就自动平分天下，二话不响，倒头酣睡。从中部往洛川，刚出北城，一些人离开公路向左边山上走去。一打问，他们说去参观“桥陵”。呵！“桥陵”不就是轩辕黄帝陵吗？我跟着上去。山不高，坡度小。宽展的黄土路通向一座高大的土丘，那就是黄帝陵了。多株盘根百节、有的顶部已经枯秃的古柏分散在周围，不知道他们跟秦汉唐宋哪朝哪代打过交道。整个陵上没有奇峰异石，云海飞瀑，没有后人的凿空点缀。景物淳朴自然，气象厚重宏阔。陵前这时有人招呼：各位，黄帝是我们伟大民族的老祖宗。我们的民族正在受苦



受难。老祖宗的好子孙要为我们民族争光荣。大家向黄帝行礼吧！我细看了一下，集合在一起鞠躬致敬的大约近四十人。前面的人下山，后面又陆续有人上山。他们就是在这种奋发自觉的精神状态下一路走来的。

这时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人，1943年延安主管部门提供了一个数字。抗战初期，有四万多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其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0%。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招生，学员近五千人。我7月到洛川，进人的是第五期。11月以后，我所在的洛川大队与庆阳大队等合组成抗大一分校，迁往晋东南，共六千人。二分校同时组成前往晋察冀，人数不详。有人说1937、1938年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已达十万多人，尚待考证。这些人中，最多的是青年学生，也有文学艺术工作者、新闻记者等等。他们来自除西藏、青海以外的全国各省市，更有海外华侨。他们最初的行动，绝大多数是单个的或者只是少数人相结合的。他们就像山上石头缝隙里的清泉，最初是点点滴滴，然后聚成小小溪流，无数的溪流聚集起来，再变成可以泛舟楫的河流，多条小流相汇合，最后形成一条大河，洪流滚滚。这些个人，最初的行动虽然是怀着一定愿望自己选择的，却是带有很大偶然性的。例如我从一个刊物上看到关于抗大的介绍、刘浴生决定同我一道走，就是这样。中国面临被日本灭亡的现实危机，中国共产党广泛的政治影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使几万甚至上十万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汇合成奔向

延安去的洪流，又是必然的。渐变发生突变，改变事物的性质，必然性与偶然性不可分开，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实现。事物的偶然性说明“宿命论”一类是没有根据的；必然性说明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可以认识的。当那单个的、一伙一伙的青年学生个人，排除各种困难，在前往延安的道路上行进的时候，许多历史事件还没有发生。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说明这个洪流不但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的要求，也是反映的中国社会历史运动长期的走向。这是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他们的环境条件各不相同，到延安去的只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极少数，不过在青年里面，他们是一般地怀有新的政治思想倾向，并且把自己的爱国心首先表现为选择到最艰难的战场上去的少数。他们的政治思想认识等，也显然参差不齐。我在到达目的地以前，还提醒自己：“国学”是我们祖宗立国的根本，切不可忘记。是社会生活的实践改变了自己的认识。

洛川是这一路上比较热闹的县城。抗大洛川大队入学报到处，设在城北偏西十几华里的一个村庄。我到那里很快就办完了入学手续。村外庄稼全是种的玉米，长有一人多高。快进村子了，我突然觉得从长沙一直跟随到这里形影不离的软本船形帽似乎太过时落后，使劲扔进了玉米地里。意思是从此与旧社会分手了。以后每次同人谈起来，不得不先来个自我解嘲：“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病！”